



第一辑
阅读与回忆

学人苦魂

学者生涯无非是静心读书研究而已，但是，社会动乱和政治风雨打破了书斋的宁静，从而使学术人生充满了沧桑和艰辛。葛剑雄的《禹贡传人——谭其骧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学术大师心路历程的契机。谭其骧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大师级的人物。在历史劫难面前，传统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书生本色，如陈寅恪、顾准、沈从文等等。在《海瑞罢官》等批判运动中，性格耿直的谭其骧自然留下了供人批判的“罪证”，后来又因奉命为毛泽东注释古文而得以“体制内生存”，但是，这仍然无法消钝其不合时宜的一面。他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在学术自由成为一种奢侈品的情境下，执著于学术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叛逆。陈寅恪曾言：“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学术注定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它要求治学者自觉地排斥主导社会的种种声音，用漫游者的从容和潇洒回到本原的智慧和精神境界中去。没有这样一种信仰生活做支撑，所谓的学问就只不过是一种包装，一种装饰而已。

“十八而志于学，从今而后，矢志不移”的谭其骧，在盛极而衰的家道中，选择了求学之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他较好地承继了恩师顾颉刚、邓之诚博闻强识、文史兼通的学术品格。对于智者而言，知识的边界是不存在的。按照工具理性来操作的学问注定是不纯粹的。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成绩“应列第一”（顾颉刚语）

的谭其骧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了对现实功利的强烈排斥。他没有按照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约定去领取一张含金量不低的硕士学位证书，而且从来没用过这个头衔这种超凡脱俗的举动在今天这个证书泛滥、学位贬值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拒绝把知识转化为一种权力，拒绝把学问当成标签和虚名，这正是真学者大异于学术市俗之处。谭其骧在《禹贡》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一不偷懒，二不取巧务名……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志》、《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的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正是由于发扬了苦学传统和科学方法，谭其骧打下了极为厚实的学问功底。谭其骧那一代学人何以大师辈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站在新与旧的焊接点上，既保持了人文传统中质朴坚韧的一面，又吸收了广阔的世界眼光和理性气质。所谓“世道愈乱，贤士愈积”，就是指“乱”带来了重新建构的空间和机会。旧的苦学精神加上新的治学方法使得自由创造成为可能。

从抗战时期流亡后方，到参加土改，从思想改造到肃反运动，再到“文革”，正常的学术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谭其骧对种种运动充满了困惑。在西叶村搞土改的时候，他不明白：为什么贫雇农更加痛恨的不是地主而是那些“二流子”、“顽干”？地主的罪行明明不够死罪，为什么非让群众要求加以镇压？“三反”之后的思想改造，跳黄浦江自杀未遂的刘大杰作出的检查是《清算我的投机思想》，谭其骧被定为“个人主义的带有封建性的纯学术思想”，则更加让人弄不明白。反胡风运动时期，让谭其骧无法想到的是，写匿名信揭发所谓“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到“文革”时期，在劫难逃的谭其骧的困惑自然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次思想汇报、认罪忏悔，一次次上纲上线的批判，将知识分子变成了战战兢兢的政治动物，正常的学术生态遭到重创，杂草丛生。幸亏有编绘

“杨图”、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这样的政治任务，才使谭其骧得以继续操练学术，虽然这种操练是强制性的，体现的是荒谬的政治意图，但是，比起身陷囹圄的顾准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当然，人所承受的苦难、所面对的命运具有绝对的不可比性，那些“感谢苦难”的浮辞不过是局外人的矫情而已。

一个人的政治

读钱穆的书，我们的心会变得沉静许多，这不仅是因为钱穆先生反复强调要平心客观地检讨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钱穆的目光有一种穿透力，能够拨去浮在历史表层的尘埃和伪饰。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更关心的是传统政治的根蒂，而对名目繁多的口号、制度和革命抱以审慎的态度。他说：“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类似的话，鲁迅先生也说了许多，割掉了辫子，一切还照旧，“这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社会变革无法连根拔掉，全部从头再来，但是，如果忽视了根子上的改造，戴上个面具便跟着别人一路跑去，最终会走上迷失之路。

在钱穆看来，读史，不是单纯的审美享受，也是经验和智慧的盘点。中国历史首先是一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史。没有强烈的攫取权力的欲望，历史就会萎缩。正是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樯櫓灰飞烟灭的历史大潮中，英雄才会光彩四溢。一些历史学家把中国历史简化为一兴一亡、一治一乱的历史，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殊不知，中国人在皇权的维护和修复上面，穷尽了智慧。钱穆认为皇帝专制并不是历史事实，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无比微妙。传统中国的政治框架是家国同构，秦汉统一把贵族公侯纳入郡县管理，化家为国，皇帝是家长，宰相是管家。皇帝是权力的象征，而宰相却

是权力的实际操作者。

传统中国的政府是士人政府，崇尚文治，宰相大都是读书人出身，历经各种考试，饱览史书，装了一肚子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皇帝大都是不读书的流氓。读书人在皇宫里的斗争中很难占据优势，汉武帝临死派霍光做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结果锐化了朝廷与皇宫之间的冲突。本来汉武帝是为后代小皇帝着想，是控制权力的一种方式，却造成了内廷权重，外朝权轻的局面，从而失去了用制度来限制皇权的可能。所以，只能把国家的兴盛寄希望于明君的出现。中国历史上出过几个好皇帝，带来的只是人事好，却无法构建一个好的制度。没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皇帝代表着最大的合理性，不容置疑，无须商量。一个人说了算的政治其实是最不经济的政治，一个人的错误要搭上多少条人命，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来弥补。

钱穆通过对历代制度的分析，批驳了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的观点。无论是监察制度、选举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几乎每个朝代要换一套，可是，这些修修补补并不能根除专制政治的弊端。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贤人政治，通过严格考选而出人头地的书生也曾经做出向清明政治迈进的努力。可惜，其力量实在是过于微弱，终究无法产生根本性的作用。封建社会的制度几乎都是对皇帝有利的。所以，中国从来都不会像英国那样把皇帝送上断头台。钱穆试图证明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钱穆运用许多历史细节来论证这一点。我们相信，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政治制度给社会 and 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否则，它就不会延续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制度虽然留有缝隙，却鲜有人在其中游刃有余。人们已经习惯了僵硬的设置，制度虽然有活口，人心却是死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

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制度是一种历史需要，是人们在现实环境里面的一种理性选择。官逼民反，实质上是制度滞后的一种强烈反应。当造反者坐了皇位之后，他们改进制度的兴趣也就大大降低。从利到弊，再到积重难返，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而一旦到了重法术轻制度的地步，就会形成政治的怪圈：“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虽然对封建统治的批判色彩有些淡，但对今天的执政者来说，仍不失一付清醒剂。诚如钱穆所言：“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不发议论的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是一个不好发议论的人，这一点使他具备了许多作家学不来的深刻和从容。20世纪20年代，老舍先生客居英国的时候，躲在伦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写了《二马》等小说。《二马》中的马威是一个老舍先生并不满意的人物，身处异域，却又操心国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发议论，然而这些议论的确是太没有味道了。老舍讨厌马威，因为“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是个活人”。老舍认为随意大发议论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他说：“凭着一点浮浅的感情而大发议论，和醉鬼借着酒力瞎叨叨差不很多。”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大发议论》，对镇上那位好发议论的“爱国志士”极尽嘲讽之能事。老舍先生之所以不爱发议论，与他超脱的社会角色有关。“五四”运动时，他是个旁观者，北伐时他在国外。回国后，老舍对风风火火的革命文学运动又保持了距离。老舍先生的文学成就得益于他的“旁观者”姿态，出身于市民家庭的他深谙社会矛盾的本源，可是他又离不开这片文化土壤，所以他“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老舍没有把自己设置成“启蒙者”，他宁愿在“含泪的笑”中体味人生的苦味。

生活是不允许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装模作样的，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市民大都在顽强、坚韧地生存，他们不发议论，也不绝望，即使社会黑暗得像个老烟筒，他们也能快活、奋斗和努力。老舍先生的幽默与林语堂的闲适有趣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后者是居高临下的，追求的是一种绅士风度；老舍先生却是把自己混同于可笑人

中间的，他笑的首先是自己，因为自己上过当，吃过苦头，所以，才明白了其中的门道。他没有刻意去寻找笑料，而是在市民生活中发现人性和真诚。对于生活而言，老舍先生决不是一个袖手旁观者，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大发议论的资格。他没有把自己放在绝对安全的位置，所以，他的文字没有丝毫的伪善意味。大发议论者企图用所谓的思想来掩饰内心的苍白和空虚，是“瞒和骗”时代的人生方法论，老舍先生对这种表演化的人生极为反感。议论蒙蔽了心灵，抑制了“真的声音”。正因老舍先生不发议论，所以，他常常在不经意间触到了生活的痛处。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说：“头脑清醒的人能摆脱那些异想天开的‘思想’，能直面生活，认识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成问题的，并感到自己的失落。”老舍先生的清醒不是一种标榜，而是一种体验，一种选择。老舍先生笔下的笑所承受的分量太重了，不是为了逗趣，而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所以他的笑有一种震撼力。

不发议论使得老舍先生拒绝调侃。老舍先生尽管是一个说话高手，但是他并不关心语言技巧，他反复告诫人们：“清清楚楚、老老实实的文章也能是好文章。勉强耍几个字眼，企图取笑，反倒会弄巧成拙。”别人笑的时候，老舍先生往往笑不出来，因为他识尽了人生的悲凉。他偶尔也说一些灰心的话，混杂在该谐的语句中，不被人注意。重读老舍，我被这种沉重所缠绕，难以释怀。挥之不去的是这样一些语句，“世界是个大网，人人想由网眼儿撞出去，结果全死在网里”（《二马》），“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离婚》）。在老舍先生看来，生活是一个圈套，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得清楚，在这里大发议论帮不了我们什么忙。老舍先生把一味空谈的人称为“最可怕的人”，因为“他的心比一个小酒盅还浅”（《多鼠斋杂谈·最可怕的人》）

所以，我们最好什么也不说。

周作人的读书情趣

出版界几乎是同时推出了《知堂书话》与《周作人书话》两本书。“周作人热”与他的轻松与优雅有关。周作人并没有赋予读书许多神圣而沉重的内涵，他认为：“看书真是平常小事。”周作人的这种随意和清淡来源于他对生活情趣的追求。有人说周作人的读书态度是纯粹的，消除了许多功利性的东西，也回避了许多与读书无关的东西。读书如同品茶，须读出味道来，读出乐趣来。其实，周作人仍旧把读书当成了一种生存策略，他在1928年写的《闭户读书论》中这样写道：“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读书是文人游弋于入世和出世之间的秋千，他们的专心致志与漫不经心都是一种自由心态的外现。周作人把读书比做吸纸烟，纯粹是一种消闲。所谓消闲，不仅是指我们平常所说的“看闲书”，周作人的确看了不少闲书，如小人书、科学小品、妖术史、恋爱诗等，但他更多的是读中西方有名的文字。在周作人的阅读视野里是没有名著与非名著、畅销书与冷僻书之分的，读与不读全看有无趣味。在周作人看来，读书就如同和一个人谈话，如果他满嘴套话，干瘪无味，就不必硬着头皮静听下去，“掩卷放下，等于端茶送客，也是正当”。由此看来，周作人是一个随便而又极为讲究的读书者，大凡不合他口味的书籍无论有多大知名度他都是不屑一顾的。

周作人认为“读文学书好像喝茶”，品书是一种无关功利的读书方式，如同雪夜访戴，兴之所至，兴尽而返。周作人的书话是长短不一的，有的只有片言数语，三言两句，有的则滔滔不绝，大加发挥，高兴处干脆大段大段地抄录，像一位胃口很好的食客饱餐一般。在读日本一位普通女作家的《爱的创作》的时候，周作人“觉得很有趣味”，原因是这位女作家主张在恋爱问题上不能静止不动，须时时出新，这个令道学家们不能忍受的观点，在周作人看来却是“养爱的正道”。周作人随之抄录了其中的精彩片断：“在花的趣味上，在饮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选择上，从少年少女的时代起，一生不知要变化多少回。正是因为如此，人的生活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都有进步……”这段话与周作人的“趣味说”可谓是一拍即合。这不仅是养爱的正道，也是养书的正道。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道学家之所以害怕“爱之移动说”，是为了“强迫不慎的买主收纳有破绽的次货”。他进一步指出：“生存竞争之说很为中国人所反对，这便因为自己没有生存力的缘故，并不是中国人真是酷爱和平。”真理可以自我标榜，美丽可以自我陶醉，善良可以自我伪装，惟有趣味是无法强求的，太浓的人工色彩反而使人更加反感。不讲究趣味的读书，不是读书的本色，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也。

趣味不能整齐划一，以趣味为标准来读书，实际上就取消了读书的所有框框。古人有言：“读书着不得一点为人的心，着此便断根，虽孜孜穷年，无益也。”（《李榕村集》）带有私心杂念的读书自然没有趣味可言。周作人希望用“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这样的文章也许会更耐读一些。按照趣味来读书，是一种解放。我们不少读书人是把读书当做一件苦差事的，这一方面压抑了自我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刻意做出一些姿态。

不讲趣味的读书人是没有灵性、没有自我的，他懒得选择，他

总是在张望，在看人家读得津津有味。趣味，只属于那些大胆而又细心品尝的人。周作人的这种自娱的读书方式，既有士大夫的那种自我满足与安慰，也体现出一种自由奔放的读书追求。单就读书而言，搞点“私人化”，对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并没有坏处。

有不少人仍习惯于把读书搞成热热闹闹的社会活动，制定这样那样的读书目标，书评家们也在忙着挖掘没完没了的“深度”与“内涵”。周作人是不赞成这种虚妄的口气的，他在《谈笔记》这篇书话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与理想都难实现，我只希望能具体而微，或只得其一部分，也可以满足了。”这种读书态度是老实和真诚的。

文学态度与功利诉求

文学史实质上是观念形态的文学话语，它通过对文学的反思和追问来实现对精神秩序和知识秩序的建构。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利》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踏上文学史理论之旅的机会。文学史是舶来品，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文学史的写作体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努力。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文学是一门实用和功利的学问，是通往仕途的一个手段。许多文人通过卖弄文字、斟酌辞章获得了“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机会，而那些被挡在体制之外的文人则借助文学娱志宣情，寻求解脱。文学史的历史是一部启蒙史，一部叛逆史。“什么是文学”这个被忽略了两千年的命题成为文学史的精神基点。

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离不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勾勒和判断。文学史是一门个性化极强的学科。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视野。李敬泽、祝勇 2004 年搞了一套“一个人的文学排行榜”丛书，凸现了个人态度和趣味对文学评价的影响。把文学史写成教材本身就带有话语霸权的色彩，给文学下结论，为某种文学现象命名，这种行为本身就有些粗暴。文学史作者的删减选择规定了阅读者的视野。一部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接受史，它不仅是学术积累的结果，更是美学审思的反映。文学史不是资料的一般性汇集，也不是各时代文学兴替沿革的原样记录。文学史写作既是对文学精神的挖掘，也是对文学权力的分配。“革命话语”的文学史对学术传统的中断，根本

目的就在于重构文学权力。新观念与旧传统的相互渗透和抵触把文学史打造成了一個虚拟的权力平台。观念与史实之间的张力给话语权力的运行以充分的空间。文学史的权力不是体现在文学座次的排列上，而是蕴含在阐释和理解之中。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具有先天的矛盾性。按照西方的学术范式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轨迹，是方法的革命，也是文学传统的无形解构，“体辨源流”的旧学术思路被打破，经史子集要放到西方语境中的“文学”框架下重新考量。批评话语的转换造成了文学权力格局的倾斜。历史不能穷尽文学的丰富性，但是足以肢解和歪曲一代文章之盛。用治史的态度去体会文学，去逼近真相，去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是一种笨拙的努力。在线性的叙述中体验文学显然是荒唐的，文学不是均衡发展的，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是，文学的平庸是时代所无法阻挡的。文学的演进并不遵循物理上的时间流程。文学史要成为“信史”，不仅需要扎实的实证和可靠的史料，更要靠价值重估的勇气和批判精神。胡适把史料的搜集、整理看做是科学的工作，把史实的叙述、解释看做是艺术的工作。文学史是学者的事业，更是文学家的事业。我们无法相信一个缺乏文学经验的人会写出一部具有文学精神的文学史来。

文学史家的价值立场决定着他对文学源流的理解。“五四”学人如郑振铎等在文学史写作中表达了强烈的民间立场，体现了对帝王文学的反动，是以“人的觉醒”为核心的人文思潮的反映。文学史家的尺度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精神性的。用精神灯火照亮被遮蔽的文学史，用科学的态度和手法去考证和发现历史真实，是实现一个“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胡云翼语）的前提。近代文学史的发端是对“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语）的中国旧史书传统的叛逆。历史叙述的过程是价值设定和意义生成的过程，完全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是不可能的。文学

史是一条思想的河流，按照自己的流向奔腾。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的内心生活史、梦想史和心灵痛苦史。

作为大学中文系课程的文学史是对常识的一种集体接受。20世纪50年代，在“革新一切科学”的旗号下，文学史被迅速地改头换面，用行政的力量调动人员集体编写文学史教材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方式，也是贯彻领导意图、紧跟政治潮流的一种集体狂欢。知识、思想、话语和教育的权力在赋予集体话语的文学史以绝对合理性和绝对权威性的同时，也瓦解了文学教育的本体意义。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垄断了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被强行割断。中国文学史成为了对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人的阶级出身进行纠问的政治档案。批胡适、批《红楼梦》、批《水浒传》，在高调的斗争姿态面前，文学的丰富性和人性的深度内涵都被风化了。文学史不再是一种启示，而是一元的规定。在那个古典文学作品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的意志和生活”的时代，我们还能对文学史教材有什么指望？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所谓“重写”，不仅是恢复常识的一种努力，也是在话语霸权解构之后，对文学史精神空间的拓展和对文学史魅力的尽情享受，其价值取向正如近代学者黄人所言：“使服从之文学变为自由之文学，一国之文学变为世界之文学。”

坑灰未冷心犹热

“三家村”事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病案，是中国知识分子受难史上浓重的一笔。《书生累》一书汇总了关于“三家村”笔祸的有关资料，包括姚文元、丛新耀等人的口诛笔伐。耐人寻味的是这本书用了“深酌浅饮‘三家村’”这一副标题，显示了面对历史灾难时的平静与从容。

富有乐天精神的中国人一向是对分析过去的受苦经历不感兴趣的，人们喜欢用虚幻的梦想来寻求解脱，所以，经历过苦难的知识分子往往在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浪漫主义的想象中弥补精神上的缺环，而极难以冰冷的理性来与苦难对话。这是造成书生累的重要原因。内心的反省固然重要，而对记忆的梳理、对灵魂的拷问、与历史的对话更加可贵。对文化病案的解剖其实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须时时提起，与心灵的蜕变同步，所以说深酌浅饮是颇有意味的。悟透一段谜一样的历史，不但需要对过去做出深刻的追思，而且要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有洞若观火的明察。李辉说：“历史如同一个茶馆，不断地变换着话题，但也不断重复着话题。”所谓文化的危机其实就是在阐释历史、描述现实、预言未来中的价值错位。

今天回过头来看“三家村”，好多人都感到无话可说。廖沫沙在“文革”结束后，坚定地说：“是‘毒草’还是‘香花’？这都有文为证，用不到我在这里多作申辩。”吴晗当年曾经愤怒地说：